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

(1912~1928)

郑国○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

(1912 ~ 1928)

郑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068-5386-6

I. ①民… II. ①郑… III. ①迷信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①B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1484 号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

郑国 著

责任编辑 祁 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管佩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青岛华星爱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 120.4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386-6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迷信是思想上的非智信和行为上的偏执,具有实用性、功利性、散漫性、肤浅性、欺骗(自欺和他欺)性、准宗教性等特点。

特定的历史环境搭建了迷信充分表演的舞台。民国前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型的动荡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连年、权威真空、教育落后,这为迷信泛滥提供了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传统迷信泛滥依旧,且代谢出新;国外传入的新式迷信灵学掀起了文化逆流。这一时期,迷信与政治进退暗合,与文化守旧一致,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阻力。在某种意义上,迷信是新旧势力的分水岭。从迷信破除的角度出发是认识民国前期思想历程和社会变迁的良好视角。

与迷信相关的人群可分为利用迷信者和盲目迷信者两个相对的阶层。从目的上看,利用迷信者以迷信来神道设教、骗钱敛财、招揽会众;盲目迷信者则以此祛灾祈福、崇德报功、预知祸福、藉神自卫。从对象上看,迷信对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现实利益无关的事物很难进入到人们迷信的视野。民国前期迷信的对象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涉及自然和人文两大方面,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灵魂问题以灵学的面貌混淆视听,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从形式上看,有些迷信形式,如求雨因天灾屡至而频繁;有些迷信形式,如祀孔因人祸而出现反复。灵学是民国前期迷信形式的新成员,从发展趋势上看,逐渐衰亡是民国前期迷信发展的一个总趋势。从特点上看,民国前期迷信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区域性。从影响上看,民国前期迷信不但浪费人力物力,破坏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政治

倒退,阻碍社会变革,为愚昧专制张目。同时,迷信虽然具有一时的安抚与麻醉作用,但长远来看,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虚伪、依赖与自私,丑化了国民性格,禁锢了社会智慧,是阻碍社会变革发展的深层痼疾之一。

近代以来,在国人向西方学习、追求民主与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迷信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晚清先进人士对此已有一定认识。民国前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人重视思想革命对社会革命的重要影响,对迷信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对迷信的批判达到了一定的力度。政治批判、文化批判、风俗改良构成了民国前期迷信批判的三部曲。历史证明,革命是破除迷信最猛烈的风暴。政治批判是随着民国前期革命势力的发展而渐次展开的,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等三个阶段对迷信的冲击尤为显著。但是,革命的暴风骤雨并不是解决思想观念问题的根本之道。文化批判和风俗改良是迷信批判深刻性所在。新文化运动本着为辛亥革命“补课”的目的,从“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出发,对鬼神迷信和灵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足的是,这一时期迷信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以及风俗改良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影响了迷信批判的效果。

编 者

2016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引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迷信的内涵与外延	[2]
(三)学术史综述	[9]
二、民国前期迷信泛滥的因缘	[14]
(一)迷信之因	[14]
(二)迷信之缘	[15]
(三)晚清迷信发展概论	[17]
三、民国前期迷信的目的	[27]
(一)利用迷信者	[27]
(二)盲目迷信者	[34]
四、民国前期迷信的对象	[47]
(一)自然对象	[47]
(二)人文对象	[55]
五、民国前期传统迷信的形式	[61]
(一)祀孔	[61]
(二)祭祖	[64]
(三)赛会	[68]
(四)求雨	[75]
(五)占卜	[80]
六、民国前期的新式迷信——灵学	[88]
(一)灵学思潮的形成	[88]
(二)灵学的理论与灵学的活动	[94]

(三)灵学思潮泛滥的因缘	[101]
七、民国前期迷信的特点与影响	[105]
(一)特点	[105]
(二)影响	[108]
八、民国前期对迷信的批判	[120]
(一)政治批判	[120]
(二)新文化运动对迷信的批判	[131]
(三)风俗改良对迷信的冲击	[146]
(四)民国前期迷信批判的特点、局限及教训	[152]
参考文献	[155]
后记	[160]

一、引 论

(一) 研究缘起

迷信渊源于人类对自然、人事的不可知，植根于民众苦难的生活，构筑于小农经济狭隘眼界的基础上，促发于历代统治者的利用推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蕴蓄。此外，人们的心理因素、思维方式以及习惯势力等无形因素对迷信的传播与泛滥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长河看，早期迷信是人类意识的萌芽与最初的表演，是在主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自我膨胀和自我满足，以及在这种膨胀下无比自信的能动力量，是人类开始自觉思考和认识世界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迷信表达了人类无限美好的心愿，其探索的努力奠定了日后人们探索的基础。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向往的美好前景将由科学代替迷信而逐步实现。关于这一点曾有人作过牵强的比附，如把“腾云驾雾与气球飞机飞艇”、“千里眼与望远镜”、“顺风耳与无线电话”、“摄魂召魄与催眠术”等相比较^①。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迷信越来越表现出落后的一面。它造就了专制愚昧赖以生存的土壤，并与之结合成为历代专制者的护身符，麻木民众的思想，禁锢民众的行为，阻碍社会的进步，是导致因循守旧、顽固不化、不思进取、素质低下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影响之深，流弊之远，至今未除。特别到了近代，在清末衰世和外族入侵的交扰下，民众的苦难达到了极点，迷信之风为害尤烈。

近代以来，众多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抗争，但他们大多没有或很少重视影响国民素质和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迷信^②，没能从深层次上反省民族落伍与抗争失败的原因。对此，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是“理性缺位的启蒙”，指出启蒙“太急于求成了，因此太注重于用一个又一个现成的学说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而忽视了功效。似乎比较迂回的包含启蒙思想家在内的整

^① U·B·：《神话——科学》，《申报》，1923年8月16日。

^② 鲁迅小说《药》、《祝福》等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终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予起码的重视,更不用说给予足够的重视了”^①,甚至科学也被过度强调了其精神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权威,“一种替代宗教的形式”^②,言之为迷信也不过分。

民国前期(1912~1928),作为我国历史上相对来说政治动乱、社会衰败、文化争鸣、意识形态危机的又一显例,颠沛流离、生活困顿、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加剧了民众心理的脆弱性与命运的漂浮感,造就了迷信泛滥的社会与心理土壤。反动的政治势力与文人刻意鼓吹支持利用迷信,希逞其觊觎之志,形成迷信泛滥的政治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下层民众的信仰取向。因而,民国前期社会成为迷信涌动的乐土,其泛滥传播状况较往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既流行于社会上层,也肆虐于社会下层;既有世俗迷信的漫流不止,也有天命政治迷信的高潮迭起;既有历史上一脉相承的传统迷信,也有新近从西方贩入的洋迷信,土洋杂陈,贻害无穷。

因此,运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相关知识,辨析迷信与科学、宗教、邪教、习俗等的复杂关系,理清迷信真实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认真研究这一时期迷信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时人对待迷信的不同态度,特别是研究迷信与近代思想启蒙的相互关系及时人对待二者的相关论述、争鸣,对于揭示迷信的危害,尽量重现当时的社会面貌,展示民国前期思想解放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科教昌盛的今天,迷信依然有其藏污纳垢之地,邪教如“法轮功”者一度肆虐横行,相当多的民众在思想行为上对迷信依旧恋恋不舍。以史为鉴,对当前社会破除迷信、启迪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作用。

(二)迷信的内涵与外延

1. 迷信的定义

从词源上看,迷信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近代以前,迷信用来指代一种世界观,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在中国,它主要是指“与理学提倡的正统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相对立、有碍正统伦理秩序推行的社会和思想活动”^③。佛教

^①姜义华著:《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②[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③王铭铭著:《逝去的繁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则用迷信指代不信佛教或信奉其他教者，并积极提倡与其相对的智信。在西方，迷信主要是“一个较广泛的思想与信仰系统中的组成部分”^①，即与各种形式的所谓“异教徒”宗教密切相关的信仰。随着科学的日益昭显以及宗教上的相当宽容，近代以来的迷信逐渐失去了原先系统的世界观意义，转而成为整体上杂乱无序的充满落后与荒诞性的贬义词。

迷信的内容繁芜博杂，涉及科学、宗教、邪教、习俗等诸多社会事象，因而对其概念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江绍原认为：“一切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为，我们皆称为迷信，其中一部分（或许是一大部分）通常用‘宗教’‘法术’两个词去概括。”^②可见，江绍原是从广义上来理解迷信的。与其持相似看法的还有洗震，他认为迷信有两种理解：“一曰迷信者不知而信之也；一曰迷信者深信也。”^③

从因果辩证关系出发，蔡元培认为迷信是由因果不明所致，“昧理之人，于事理较为复杂者，辄不能了然，于其因果之相关，则妄归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依赖之”。进而，为建立人神之沟通，种种迷信如巫觋星象等产生了^④。显然，这主要是从狭义上来理解迷信。胡乔木也认为：“迷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信鬼怪命运灵魂等等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相信这些东西支配着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水火木石、舟车门灶、生老病死、成败祸福，总之是支配着世界和人生的一切，并且要和这些东西来往，就必须依靠各种宗教的仪式和法术。”^⑤

以上关于迷信的理解或从广义或从狭义出发，但立论都以科学为坐标，局限于在迷信学上定义迷信。从观念上讲，迷信就是非智信，不知而知；从行为上讲，迷信就是不知而行，盲从，执迷。现实中的迷信是这二者的结合体。由于迷信广泛的世俗性与较强的民间传承性以及习俗的深厚浸染性，迷信的存在和传播往往超出自身之外，而与思维方式、习俗甚至社会势力等结合在一起。因而迷信应包含这样三个层次：首先是行为，这是迷信的外壳，包括职业的和非职业的、固定的和散漫的，表现为顽固与荒诞。其次是势力，这是迷信的中层，表现为具有相同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的一定阶层，往往是社会变革的保守势力。最后是观念和习

①[奥]G·贾霍达著，曹阳译：《迷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②江绍原著：《礼俗迷信之研究概说》，《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③洗震：《迷信之解剖及其效用》，《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二期。

④蔡元培著：《德育三十篇》，《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⑤《反迷信提纲》，《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惯,这是迷信的内核,表现为迷信的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惯性的无意识认同。从这样一个迷信的科层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科学的日新月异与教育的突飞猛进依然难以克服迷信痼疾,因为它们只是破除迷信的外围战而已。要深刻理解迷信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迷信与宗教、科学、邪教、习俗等的关系。

2. 迷信与宗教

关于迷信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基本可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迷信与宗教既有渊源上的联系,又存在程度上的区别。江绍原即指出:“假使粗鄙的神观念和灵魂观念不先出现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较进步的民族能独立的从旁的道路到达较‘合理’较‘精粹’的神观灵魂观吗?高等的和低等的宗教之此二观念果真是有种类的而非仅程度的差异吗?‘鬼’与‘灵魂’、山精、河伯、树妖……与‘管理全宇宙的神圣的心和意志’,果真是绝不相蒙的吗?”^①牙含章也认为:“有神论和宗教,既有密切关系,又不是一回事……有神论是宗教的思想基础。反过来说,并不是一切有神论都是宗教”,也就是说“宗教是迷信,但不一定所有的迷信都是宗教”^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凡宗教都认为对此岸有限之物的信仰为迷信和偏见,而对彼岸的无限绝对的敬仰才为宗教和真理”^③。这种看法过于强调迷信与宗教种类上的差异,似有割裂二者之嫌。而且,将迷信和宗教分别描述为“信仰”和“敬仰”,显然并不客观。

众所周知,信仰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的依赖性与顺从性。迷信和宗教皆是因人类在物质与精神领域中的局限而产生的在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幻化。笔者认为二者具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没有种类上的区别,迷信的不一定是宗教的,而宗教的一定是迷信的。

(1)从起源上看,宗教是迷信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考察宗教发展的历史,德国学者卡西尔发现:“一切较成熟的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之一,就是要从最原始的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之粗糙素材中提取它们的新品质,提取出它们对

^①江绍原:《礼俗迷信之研究概说》,《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页。

^②牙含章:《有神论和宗教的起源》,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415页。

^③卓新平著:《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生活的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①中国学者陈来认为,在春秋时代卜筮星占等迷信思想与行为明显向理性化过渡转变,人们由对卜筮星占等迷信的个体对象的思考与回答扩及到对整个宇宙秩序与法则的思考与回答,试图寻找涉及整个世界的规律,“在中国古代,作为宇宙和命运秩序的‘天道’概念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②。

(2)从内容上看,无论是以“绝对”和“彼岸”,还是以“相对”和“此岸”为信仰对象,迷信终归属于信仰这一范畴。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境界,而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外在化的精致的表现形式。相比之下,粗糙的迷信要比精致化的宗教更为根本、率真,更能表达人类最原始的欲求。二者在信仰对象的重合性上是不言自明的,实质上都指向超自然领域,都相信神灵的存在。

(3)从目标上看,二者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一致性。迷信和宗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只不过迷信是低层次的追求,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即蒂里希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③,并通常体现为物质利益的实现。宗教是终极追求,通常表现为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满足。

(4)从演化上看,不但迷信曾析出宗教,而且随着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和普泛化,宗教的某些内容逐渐低层次化而成为迷信,如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就成为支配广大盲目迷信者心理和利用迷信者的愚民武器。

3. 迷信与邪教

迷信是邪教产生和发展的土壤,邪教是对迷信的扭曲性强化。邪教一旦在迷信的基础上嫁接成功,便具有迷信不可比拟的危害。作为附着于社会的毒瘤,邪教和迷信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

邪教有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众所周知,过去宗教内部在对教义产生不同的理解时,相对于主流的那些教派通常被称为邪教,这是从宗教意义来理解的。在今天信教自由的时代,合法宗教间是平等的,已无所谓正邪之分,现在所说的邪教是就世俗意义而言的。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在宗教方面持有相当宽容的传统,且无严格的一神论宗教在本土产生,故对邪教的诠释偏重于世俗的社会法律道德等方面。它特指信仰上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行为上的反社会、反政府基本规范,理论上的反主流文化,传播上的依靠迷信邪说为诱导,打着宗教旗

^①[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②陈来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8页。

^③何光沪:《〈宗教与世界〉丛书再序》,[澳]加里·特朗普著,孙善玲、代强译:《宗教起源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号的社会异己群体。

(1) 迷信与邪教的一致性主要指二者的共存互生性。邪教的存在发展与迷信邪说有斩不断的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邪教是在迷信群体天然的分成两个相对阶层的前提下,一些野心家利用群众的迷信观念,在迷信泛滥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和组织化而建立起来的。同时,现实社会的苦难也是其得以繁衍发展的社会根源。

(2) 迷信与邪教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的危害性。在面对社会现实孤独无望时,人们选择迷信或加入邪教的动机是不一致的。选择迷信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助与叹息,是企图在精神领域消解现实和苦难,寻求身心上的安全感和依赖感。因此,在封建社会中迷信明显具有腐蚀民众意志的特性,有利于社会统治作用,由此得到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利用。但加入邪教则意味着人们在身心上俱更换庇护之所,意味着精神信仰上和行为上对现实的双层抗议和否定,明显地表现出对现实合法秩序的反抗。邪教在继承迷信某些特征的基础上,进而系统化、组织化、极端化,其明显标志就是组织秘密结社,建立起内部封建家长式统治,从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对社会、对人类的危害性更大。历史上,人们的迷信观念一直浓重不散,但只有在组织成邪教时才足以构成对现实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威胁。所以,历朝历代政府对迷信或支持利用或稍加打击,而对邪教则一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取缔。

(3) 迷信与邪教的区别还表现在对待措施上。迷信和邪教不仅造就愚昧无知,消竭人类智慧,甚至煽动社会变乱。因而,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就必须破除迷信,取缔邪教。对此,我们应具体分析二者异同,采取相应措施。

破除迷信是一项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当前首要任务是普及教育,宣传科学,让科学逐渐占领迷信的阵地。这正如列宁所言:“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①。在斗争中,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通过潜移默化的、不妥协的长期斗争取得最终胜利。但是,对待邪教则不能和对待迷信完全一样。邪教乃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迷信观念建立起来的极端社会异己群体。它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宣扬邪说异端,推行秘密结社,危及现世合法体制。巨大的危害性、破坏性成为邪教首要的标识。对待邪教必须采取铲草除根、一网打尽的态度,彻底取缔。考虑到邪教寄生于迷信,还应重视铲除邪教得以滋生的迷信基础,让邪教无处浮着,无处寄生,无处扎根。

^①《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4. 迷信与科学

作为人类思维的源头之一,迷信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双重性的。迷信在最初曾促进了科学的萌芽和产生,但后来逐渐变成了科学的禁锢。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部分行程是围绕着科学与迷信的斗争而展开的。

(1) 科学曾在迷信的笼罩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科学思想的历史上,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①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提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②观照教士与学者职业分化的历史,我们也可得到证明:“在早期社会中,教士和学者通常是同一个人,使知识和信念符合于一个首尾一贯的图像(世界观)必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知识膨胀了,当教士和学者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专门和分离的时候,这样作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③

(2) 迷信与科学在对象和目的上的重合性。二者都试图通过一定的观察回答事物之间的联系:“原始人同时既认识自然,又藐视自然;既掌握着自然,又处于自然的控制之下;既细心地观察着自然,又使自然蒙上神秘的色彩;既崇拜自然,又惧怕自然。”^④这充分表达了人类最初认识自然时谬误与真理并存的事实,涵盖了迷信与科学两个方面,并且是以迷信的形式存在的。对此,即使是在民国前期还有人认为“科学与迷信,虽正邪相反,而对于吉凶祸福问题,二者实则异途同归”^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3) 迷信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共通性。它们二者“都导致了对表面上不同然而都有着相似原因的现象之间的理解,并在相似感觉的基础上建立起它们的联系……这些巨人(牛顿、达尔文)与那些以倒水来为部落求雨的人有着极大的差别,但人类第一次创造这种仪式的思考过程,的确与这些巨人有着某些共同的基本因素”^⑥。迷信在最初体现了人类的主动进取的精神和自我探求的欲望,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努力,在这一点上,迷信与科学是不谋而合的。后来,这种体现为对

^①[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

^②[英]詹·乔·弗雷泽著,刘魁立编:《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页。

^③[澳]汉伯里·布朗著,李醒民译:《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④[罗]亚·泰纳谢著,张伟达译:《文化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⑤费鹤年主编:《迷信》,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页。

^⑥[奥]G·贾霍达著,曹阳译:《迷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真理的追求,成为人类不断前进动力的精神与努力,便是科学,而迷信则迟滞在低层次的非实证程度上。

(4)由于迷信是以神秘和虚无的方式对自然的虚幻歪曲反映,因而迷信在本质上又是与科学直接对立的。陈独秀即谈道“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可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①,这点明了迷信与科学的对立。在讨论破除迷信的措施时,人们大都会想到科学,它是我们理解迷信的坐标。江绍原明确提出:“迷信若喻为各种妖,科学便可比作各种的照妖镜。”^②

丹皮尔总结指出,“巫术同科学的起源也未尝没有关系,但是它的精神同科学精神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科学总是要去慢慢地、谨慎地和虚心地追求真理……科学之所以能够复兴,也并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巫术,而是因为人们对巫术的信仰并不能阻止科学前进。”^③

5. 迷信与习俗

迷信是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习俗则无意识地承载、延续、展示着迷信。迷信之所以能经久不息,其中习俗的传承和沉淀所形成的习惯势力起了很大影响,强化了迷信的生命力。

对于前者,弗雷泽认为,“随着知识的进步,这些仪式或者已完全停止,或者当初兴此仪式的动机目的早已忘记,不过由于习惯力量尚在继续。它们已从原来的高位跌落,不再是某一地区人们福利与生命之所依和必须认真遵行的庄严礼仪。它们逐渐降为单纯的壮观表演、化装游乐和消遣,并最终为年老的人们所完全舍弃;一度曾经是圣哲最严肃的职业,到后来却成为儿童的游戏。……然而想到那些美好的仪式表演,那些现在看来是天真无知的娱乐,都有其愚昧迷信的根源。”^④在中国,像端午节龙舟竞渡、放风筝等都是过去举行送灾除疫的迷信形式,如今我们已很难找到当初迷信的踪迹,完全变成一种民俗娱乐活动。

关于后者,钟敬文先生注目的老鼠娶亲的习俗颇有说服力。老鼠是人们迷信的对象之一,这在后文中会有所涉及。起初,由于人类对老鼠的种种危害无能为力,于是就企图通过对其崇拜祭祀达到平安无事的目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为老

^①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②江绍原:《礼俗迷信之研究概说》,《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③[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8页。

^④[英]詹·乔·弗雷泽著,刘魁立编:《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鼠娶亲。全国各地流行的春节张贴《老鼠娶亲》年画的习俗即由此而来。虽然后来人们对老鼠的控制能力有所增强,对老鼠的迷信有所减弱,比如在画中出现一只猫等,表明人类已找到老鼠的天敌。但即使如此,这种年画习俗依然流传甚广^①。

6. 迷信与封建迷信

有人将迷信等同于封建迷信,这是对迷信的误解和歪曲。迷信和封建迷信不可等同而语。

(1)从历史上看,迷信与封建迷信并非完全一致。迷信并不只属封建社会一家,克服封建迷信并不意味着迷信的最终解决。将迷信等同于封建迷信者虽然看到了迷信与封建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了迷信因封建统治者为专制愚民制造愚昧而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二者共长,却不互生,更有对抗的一面。有人指出,迷信“有着与封建主流文化系统相对和干扰的一面,它既是愚昧、落后、非文化、反文化的密集之地,又经常成为反主流、反社会的发泄渠道,甚至成为异端的旗帜和造反者的组织手段,总体上是时常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不齿和诋毁,从未获得佛教那样的官方地位”^②。

(2)从起源上看,把封建制度的落后性与迷信的泛滥联系起来,忽视了迷信存在发展的自然土壤,忽视了迷信的一定历史合理性。从概念上看,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而封建迷信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术语,显然前者的范围要比后者大得多。

所以说,将迷信等同于封建迷信,缩小了迷信的指代范围,混淆了对迷信的正确理解,不利于正确对待迷信问题。

(三)学术史综述

由于迷信的落后性与民国前期人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潮流格格不入,也与我们今天的文明建设相悖,因而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探讨如何祛除迷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 论文

小田在《社区传统的近代命运》(《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中探讨了新

^① 参见《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8页。

^② 何云:《中国迷信文化批判——对中国宗教学批评精神的一种呼唤》,《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旧势力对迎神赛会的不同态度,叙述了迷信根深蒂固的影响,点明了传统变革的艰难,指出单纯的取缔或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迷信,有效的传统变革应循着教育、经济、文化等全面改造之路。另文《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2年第10期)则研究了庙会的迷信消费问题,指出此消费是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民俗学是解构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的有力武器。吴祖德《商品经济冲击下的都市节日——上海市区岁时信仰习俗》为我们恢复了民国前期上海“三巡会”的历史图景^①。程建中《蚕神祭祀的盛会——清明游含山习俗调查》考察了清明拜蚕神之习俗是如何起源传承的,认为“天时”、“地利”以及蚕桑事业的重要性是其之所以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②。这为我们思考其他类似问题提供了思路。

社会学也是学术界认识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的有力途径。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探讨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因素接生婆、阴阳先生逐渐衰亡和现代卫生系统艰难渗入的过程,揭示了某些迷信在传统社会曾起到的整体作用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巨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③。

“法轮功”邪教事件出现之后,人们更加认识到破除迷信的重要性,学术界涌现出了许多力作。其中涉及民国前期的有龚育之的《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回顾与反思》一文,该文提纲挈领,概述了从五四运动、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以及延安时期与建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迷信的态度和行动,提出“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宣传无神的五四传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④。

2. 著作

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⑤三卷本,记述了不少民国前期迷信流变起伏的内容,如1912年的“尊孔出现高潮”、“毁庙兴学引起风波”,1913年“改造庙宇风潮迭起”、“舆论非议迷信习俗”,1914年的“禁止迎神赛会的冲突”、“绅商的惜字迷信”,1915年的“毁学兴庙的风潮”,1917年的“鬼神祭祀与迷信娱乐活动盛行”,1918年的“新文化抨击鬼神迷信风气”、“变革婚丧礼俗步履维艰”,

^①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②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2页。

^③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31~198页。

^④龚育之:《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回顾与反思》,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⑤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